

# 中国近代 小说

编  
年  
史

陈大康 著

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 中国近代 小说 编年史 一

陈大康  
著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全6册/陈大康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10153-5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小说史—编年史—中国—近代 IV. ①I207.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2713号

责任编辑 周绚隆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00千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2.75 插页6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153-5

定 价 680.00元(全六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序

1998年春,《明代小说史》终于完稿付梓,接下来想做的,便是准备清代小说史的研究与撰写。可是在普查清代创作情况时,我很快发现面临的最大难点,是自己有关清代其他部分的小说还算熟悉,但对近代小说的了解却太浅薄,根本无法构成研究的基础。很显然,这种状况若不改变,清代小说史的研究规划根本无从谈起。

在最初的三四年里,主要是做了一件事,即综观各家著述,设计了能立体地显示近代小说发展状况的编年体例,根据各家的介绍或著录,编成了一本《中国近代小说编年》。有了这本小册子,可以对近代小说的发展状况有个大概的了解,也可从中发现不少问题。在有这样一个初步的总体了解后,并非不能设计出一个体系,或扯出一个框架,然后纵横捭阖,痛发议论,这毕竟比凭空杜撰者强。可是我自己心里清楚,若要切实地把握近代小说的发展态势,或对某个问题作较深入的探讨,就立即会因占有资料太少,不敢随意作判断,因为虽已大致知道一个个文学现象或事件的存在,却不清楚它们发展变化的详情,以及它们之间具体的相互联系,研究仍然无从说起。总之,虽已做了编年的初步尝试,但对近代小说的发展发表意见,仍然是件很难的事。

要解决这个问题,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进行进一步的编年编撰,这一次的标准是尽可能地详尽齐备,而且基本上以亲见为基础,少量未亲见的保留各家之著录。从方法上来说,操作的途径是先按报纸、刊物、书局逐个地做与小说相关的编年,然后将它们组装成整体,各编年中内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资料,用“又见于何时何处”的方式注明,不再重复。有的报刊上与小说有关的内容相当丰富,形式也五花八门,若非亲见,很难想象得出近代小说史上还有这等资料。这类编年的编撰就较麻烦且费时,有的篇幅还相当大,如最初做的《申报》、《时报》有关小说的编年,篇幅都各有十五六万字,因为它们创刊较早,持续时间也长。篇幅为数万字的编年有相当大的一批,至于

那些昙花一现的报刊,往往只有寥寥数条的著录,但有时恰是相当重要的资料。这许多编年的汇总,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集合,按照时间顺序往下读,感到它确能从各个层次或侧面反映出近代小说逐步演变的进程。

不言而喻,一个个编年地做过去,将图片内容一个字一个字地输入电脑,这是件苦活,需要有耐心与韧性。不过,苦中亦有乐趣。近代报刊上字迹模糊或缺损是常事,输入电脑就因此卡壳,不得已只能暂用“□”代替。当编年做得多了,对当年的措辞行文渐渐习惯,产生了种语感,这时再结合那些模糊或缺损的信息,便可断定究为何字;或者此资料在其他报刊上又一次出现,此时通过校勘也可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字迹辨认成了颇有趣味的事,每当一个“□”终于被实体字取代后,总可以高兴一阵子。苦中之乐趣还在于发现了原先疑问的答案。如当年《绣像小说》创刊是宣称“月出两期”,但实际上从第五期开始,就没有按半月一期的周期出版,后来各期究竟出于何时,就有些论文在认真讨论,而且还莫衷一是。可是我在做编年时,发现尽管《绣像小说》出版愆期的情况较严重,但它每出一期,都必定在当时上海各大报上刊登该期出版的广告,这原来根本算不上是一个问题。又如李伯元为了维护《官场现形记》的版权,曾进行过一场诉讼。以往研究者根据间接记载知有此事,但对其语焉不详颇感遗憾。其实,此事是当时沪上好几家报纸的热点新闻,《中外日报》上李伯元自己撰写的介绍尤详,按时间顺序将那几天报纸读下来,整个案件进展与结案的过程清清楚楚。苦中之乐趣又在于不断发现新鲜而有趣材料,如林纾第一次听说有稿费可拿是多么的诚惶诚恐,他赶紧捐出去以免自己的名誉受损;又如“天虚我生”陈栩在报上刊登广告,将自己的小说明码标价出售;再如理文轩与文宜书局出版了同一本小说,为了竞争双方在报上开骂,你骂我偷工减料,擅自删节,我骂你印刷粗糙,纸张发黄。这类资料读来煞是有趣,而它们对于近代小说史研究又各有价值在。更令人高兴的是发现了具有重大价值的材料。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七日(1909年4月17日)的《神州日报》上,刊载了一则“赠书志谢”,原来周树人向《神州日报》社赠送了一本《域外小说集》,而后者则高度称赞此书:“译笔雅健,无削趾适履之嫌。凡所采录,要皆文海之新流,欧西文豪之宏著,声价之高,盖可知矣。”这是目前所知有关鲁迅文学活动的最早报道,也是对鲁迅作品的最早

的评价。此事多年来一直尘封于图书馆的陈年报刊中,由此也可以看出这则广告的史料价值。潜心致力于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是苦活与细活,可是正由于有了这种摸索与积累,逐渐建立起了对研究对象的感觉、观察它们的视角,以及将发现的资料置于整个运动过程中考察的习惯,有此收获,更可谓是苦中之大乐。

与历史上其他时间段相比,近代小说的研究似更为繁难,因为近代小说的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数量之庞大,远超过以往,故而研究的准备基础相对较薄弱,研究的覆盖比例也偏小,要作总体把握则更难。编撰《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的初衷,是想为近代小说研究作一次较大规模系统整理的基础准备,展示那数量庞大的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并尽可能地显示出资料的丰富性,以及提供如何作进一步探寻的线索。要能发挥上述功能,显然不能将那些资料叠加在一起便算了事,而必须将它们有机、有序地排列,较直观地显示近代小说发展的盛衰起伏。在研究明代小说史时,笔者曾编制过《明代小说编年史》,采用介于年谱与文学史之间的一种史料编排体例,按时序汇总各种资料,伴以必要的提示或辨析,这样可使人直观地观察到史的发展线索。《明代小说编年史》的编制是以“年”为单位,而近代小说的相关资料相当丰富,进入同治朝后就可以“月”为单位,而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完全可以做到以“日”为单位,而同一天有若干事件发生也是常见的事。这样,我们就可以作更精细的考察,了解当时近代小说是如何逐日地发展变化。而正由于是逐日排列,就不难发现所谓古代小说与晚清小说之间并未横亘着什么鸿沟,它其实只存在于某些研究者臆想的体系中。为了考察其发展变化,我们显然不能只是著录作家作品,这样虽便于对作家作品的查找,然而即使通览全书,也无法体会到近代小说的运动状态。因此,进入编年的层面就应比较多,如新作品问世、已有作品再版、作家概况、重要理论观点、清政府及租界关于小说的政策、出版小说的书局与期刊、创作地域分布等,即不仅显示近代小说运动的本身,同时也展现了制约小说运动的各种摄动力及其变化。而就作品本身而言,也不能满足于篇名与作者或译者名的著录,若有可能,则将序跋、识语、题解等作必要的收录或摘录,从而知晓其创作或翻译的宗旨、过程或针对性等等,尽可能使读者对该作有个较感性较具体的认识。于是,按此体例编撰

的编年史,就显示出了规模上的系统性与时间上的连贯性,从而提供了一个较开阔的、读者可各取所需的史料空间。

将各条资料安置于各特定的时间节点,这也不是一件简单机械的工作。在审读各种资料时会发现,其本身所宣示的时间并不可靠。譬如说,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标志着“小说界革命”的开始,这家刊物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相关的研究论文也甚多。研究者在各种问题上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但对于《新小说》各期的出版时间,大家都似无异议,因为那出版时间在该刊多期的封面或目录页上有明明白白的标示。《新小说》第八号在封面与目录页上都标明出版时间是“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1903年10月5日)”,但该刊内却有“日俄战役为现今世界第一大事”这样一句话,这表明第八号出版时日俄战争正在进行中,而日俄战争开始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904年2月6日)日本舰队袭击沙俄占领下的旅顺口,有关《新小说》第八号的出版,显然就不能按它自己所宣称的那样系于光绪二十九年的八月十五日。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刊物上也时有发生。有时,古人自己将时间弄错了,如笔者阅读的《劝戒四录》中,梁章钜的自序署“道光戊辰长至”。可是道光朝三十年,期间并未有个戊辰年,而读了自序中关于本书的成书过程后,才可以断定“戊辰”实为“戊申”之误,才能将这条资料系于该年的冬至日。

需要作辨析考证的不仅仅是时间问题。如吴棹是清末民初时重要的小说翻译家,他因最先将契诃夫的小说介绍到中国而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为商务印书馆及其旗下的《绣像小说》、《东方杂志》翻译的小说都署“钱塘吴棹”,人们依此而了解他的作品。可是,吴棹若用其他笔名发表译作或作品,人们就无法得知了。如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二日(1908年7月10日)至七月十五日(8月11日)的《浙江日报》连载的美国小说《二十六点钟空中大飞行》,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广智书局出版的《虚无党真相》,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与十月,《竞立社小说月报》第一期与第二期刊载的《博浪椎》与《开国会》,译(作)者或署“天涯芳草馆主奁中”,或署“天涯芳草馆主人”,我们不会想到这些作品也出自吴棹之手。然而,在编撰《编年史》时,一部翻译小说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出版的《棠花怨》,其题署则是“法国雷科著,中国天涯芳草馆主海阳吴棹奁中

译”。宣统元年二月初二日(1909年2月21日)《时事报》提及该书时,则注明是“吴奂中译”。于是,这两则材料将上述作品全串联起来,原来它们都是吴奂的作品。在当年,这些可能是读者们都熟知的,但时过境迁,现在须作一番考证方能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由于《编年史》的文字必须简洁,因此书中仅仅是在那些笔名后用括号注上了“吴奂”二字,以备读者了解,为此所化的一番心血,全都隐藏在那括号之中了。如果有兴趣的读者将相关资料汇集在一起作分析,那还是可以发现之所以能添加括号作此注解的推导线索。类似的事是多次发生,《编年史》中的注解都同样地扼要简洁。这些或许都说不上是重大的发现,所做的只能算是一些小考辨,可是众多点点滴滴的累积,却也可以使近代小说的面目显得更清晰些。每次考辨有收获都使人兴奋,但也因此耗费了不少时光,完成《编年史》的计划于是也不断地往后推延。

在编入《编年史》的文字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当时报刊上的广告或告白,这类资料在编撰过程中甚受重视。书局是在为推销而努力,故而片面的溢美之词触目皆是,但通过它们,毕竟还是可以了解到小说创作或翻译的起因乃至过程、评论界的褒贬、读者趣向的反馈以及出版的动向。阅读这类广告或告白,小说市场竞争激烈的气息便扑面而来,既可感受到真心为艺术者的煞费苦心,也可以发见出版商哄骗读者的伎俩,还可以看到对盗版者的斥责、威胁或无奈。那些广告或告白使我们知道了许多原先并不知晓的事件的存在,某些原先印象模糊的事实则变得清晰起来。重视广告或告白的编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它们都是登载在报刊上,时间概念非常清晰,一般可准确到日,因此可借以确定它们内容中所涉及的文学活动或现象的时间坐标,或将它们框定在一个较小的时间段内,一些刊物或作品(包括前面提到的《新小说》第八号)出版时间的最终确定,就是借助于对那些广告或告白的分析。编入《编年史》的广告或告白,一般都与小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有的看来似未直接涉及小说,如上海天足会预告将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一日(1906年3月25日)召开特别大会的广告,不仅其内容较为有趣,如会议地址是“大马路小菜场外国议事厅”,届时还请来海军军乐队前来助兴等。若联系自傅兰雅号召撰写反对妇女缠足的小说以来,涉及此内容的作品不少,此广告就是颇有价值的背景材料,而其中所云“上海妇女不缠足者已十得其五”,



也是重要的参考数据。不过,因本书的体例要求,这类资料的编入都是从严掌控。

编撰《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的这些年,也正是数码技术迅猛发展的时期,这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有着巨大的刺激与促进作用。当年撰写《明代小说编年史》,采用的全是手工操作方法。由于撰写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删改增补,稿纸上的涂改便不断地增多,还贴上了许多小纸条。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状态已无法继续,于是便只好全部重抄一遍,但这并不能做到一劳永逸,因为接下来还得重复上述过程。现在用电脑写作就不同了,删改增补与当年相比是何等轻松的事,而且文稿始终是整洁清晰。由于《编年史》的篇幅比较大,涉及到的作品非常多,到后来是根本无法记清楚各篇作品是在文稿的哪个部位。有时在著录某报刊的某篇作品时,会觉得它曾经被输入过。若在过去,要验证这个感觉,或找出它所在的位置,那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而现在依仗着电脑的检索功能,立即就可以寻得答案。正是手中有此“利器”,撰写时就较快地查清了晚清时作品被转载的情况,其实上述关于“吴棫”之类的考辨,也是因借助了检索功能而节约了大量的时间。过去拍摄是较繁难的事,现在用数码相机拍摄后可立即传入电脑,观看时可按自己的心愿将照片随意地放大或缩小。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在四十万张纸质照片中找出特定的一张,尽管排列是如何有序,毕竟还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光那许多照片就得占多大的空间。现在这些照片全在电脑里,不管是想要哪一张,只要轻轻点击鼠标,它就很快出现在屏幕上。与学界先贤们相比,我们的资料搜寻要便捷得多,也快速得多。这些年来,科技迅速发展,特别是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大量照片就是通过图书馆的文献传递系统而获得。只要将求取的清单开列清楚,人无需出门,就可以从全国各处的图书馆获取大量的晚清书籍或期刊的照片,而专业复制的质量明显地高于自己的拍摄。同时,晚清期刊网、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等网站的建成与开通,使我们能直接上网与下载晚清的书籍或期刊,而各种资料分藏于何处,也能通过网上查询迅速知晓。人坐在家,却打开了几千公里外某图书馆所藏的报纸或书籍,撷取了自己所需的资料,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奇妙了。对较年轻的学者来说,这类事可能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对从手工操作阶段走过来的人来说,感受实在是太

强烈了。有一点可以断定,倘若没有数码技术与公共服务体系的支持,本书稿的完成必然要推迟很多年。

当书稿终于完成时,我要对许多人说声感谢。我的博士生们基本上也都以近代小说为研究对象,他们的论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引用的多为学界不知或不熟悉的第一手资料。笔者先后申请到一些项目,在经费上有能力支持他们拍摄资料,进行这项工作时,他们并不是只考虑自己的论文写作,而是将拍摄的资料聚集在一起,成为共享的资源。虽然这项工作后来已由文献传递或网上下载所取代,但我最初的一些报刊的编年就是根据它们而写成。我做好的编年又发给同学们供撰写博士论文使用,而他们引用时总与原始资料相校对,发现错漏或误排等讹误,也总是及时反馈给我,这使我后来通校时减少了差错的可能性。我得感谢各地图书馆的同仁们,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根本不可能获取如此丰富的原始资料。阿英先生留下的藏书中,有些近代小说别处均无收藏,芜湖市图书馆慨然允我进入藏书室寻觅拍摄,这次经历至今印象十分深刻。我特别要感谢华东师大图书馆的同仁们,他们热心地帮助我联系各地的图书馆,负责文献传递的老师随着时间的推移换了又换,但他们一切为读者考虑的精神,以及认真、负责与热情的态度却始终如一。我还要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别是古典文学编辑室周绚隆主任,他在六七年前就和我约定这部书稿的出版,后来常关心写作的进展,并不时地从编辑出版角度给予建议与提醒,使《编年史》的编撰尽可能地少走弯路。

刚进入近代小说研究领域时,我计划用两三年时间对该领域的基本状况进行一次盘点,然后再回到《清代小说史》的撰写上。我对近代小说的庞大与复杂性实在是太低估了。《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的完成或许可算是盘点告一段落,可是时间却已过去了十四年。刚进入这一领域时刚年方五十,如今却已六十有四。耗去了光阴,留下一部或可在较长时期内有益于近代小说研究的书稿,这总比为应对某种要求推出各种著述却很快又成为过眼烟云要强些。这部书稿提供了许多值得深究的现象或线索,这也是有益于近代小说研究的内容之一。作为作者,我对此最为熟悉,自然也更想继续研究将它们弄个明白,至于撰写《清代小说史》的计划,恐怕只得继续向后推延了。

我的博士生李志梅、韩伟表、沈庆会、文迎霞、阚文文、刘颖慧、孟丽、凌硕为、董智颖、吴微、李亚娟、谢仁敏、吴建生、王鑫、张汉波、黄曼、苏亮以及两位博士后邓百意、丁峰山先后参加了资料拍摄,在此谨表致谢。

## 凡 例

一、本编年史著录自道光二十年(1840)至宣统三年(1911)共72年有关小说创作的重要事件,其中包括新作品问世、已有作品再版、作家概况、重要理论论著、清政府关于小说的政策以及小说出版机构等。以上要素之动态按时序汇总,勾勒出近代小说的发展历程。

二、本编年史以农历纪时,按时序著录各与小说有关之事件,据资料可准确到月或日者,则按月或日排列,于该日后附以公历。

三、辛亥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三十日,为民國元年1月1日至2月17日。为保证辛亥年的完整性,此时间段仍列入本编年,但以公历纪时,于各日后附以农历。

四、光绪朝前二十余年间,近代以前的小说的出版刺激了当时出版业向近代化的过渡,故本编年予以录入,除此之外,该类作品的再版一般不再录入。

五、传奇、弹词等文体并非小说,即使发表、出版时标为小说,本编年亦不录。

六、本编年录入近代各报刊有关小说之广告、告白、启事等。若不同报刊所载文字基本相同者,录入最先刊载者,并注明又见于何时何报刊。

七、凡出版道光二十年前而未出版近代小说之书坊、书局,本编年原则上不录。

八、所录资料中原稿文字漫漶无法辨认者,以“□”代之;原稿有误,原字后加括号注出正字;原稿中所用之异体字,均改用正字;原稿中的通假字(如“箸”通“著”等),原则上不改。

九、以笔名题署者,凡能查考其本名,本名注于其后的括号内。

十、为示区别,正文所录资料中原来的注释和所用的括号,均用六角括号“〔〕”标出;笔者所做的校改和所加的按语,均用圆括号“()”标出。

十一、以往各家著录为近代小说，经检阅确非小说者，本编年不录。

十二、或因藏处不详，或因种种原因，笔者尚有二百余种近代小说单行本未能亲见，该部分现按以往各家著录载入。

十三、全书采用简体字横排。资料中原稿用于敬称、谦称时的特定格式，均予取消，改用现代行文格式。

十四、本编年史附有按音序排列之《近代自著小说内容介绍一览表》与《近代翻译小说内容介绍一览表》，各翻译小说或自著小说之介绍，均取之当时之报刊。

十五、本编年史附有按音序排列之《近代小说著译者及其作品一览表》，凡有资料可考者，作品署名后注明作者之本名，同一作者以不同署名发表之作品，均归于其本名之下。

十六、本编年史附有按音序排列之《近代小说出版状况一览表》，凡能查明出版机构地址者，均注明于其下。

十七、本编年史附有按音序排列之《近代小说转载情况一览表》，各篇目下注以刊载之报刊与时间。

十八、本编年史附有按音序排列之《近代小说书刊价一览表》，各书取其初版时所标价格。书名相同而非一书者，由其价格、册数、出版书局、出版时间可见其异。

十九、本编年史附有按音序排列之《近代小说篇名索引》，编年史内出现的近代小说，凡作品有异名者，均在通用篇名后的括号内标出。

二十、本编年史附有按音序排列之《近代小说人名索引》，凡编年史内出现的与近代小说有关的人物，其字号、笔名，均在本名后的括号内标出。

## 导言：过渡形态的近代小说

近代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很特殊的一个发展阶段。在此之前的古代小说，特别是明清小说，在三、四百年间维持着不变的形态；而在此之后的现代小说，若就其创作的各要素而言，也是基本保持着较稳定的态势。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明显是两种差距甚大的不同类型的作品，而衔接两者，由“此”转换为“彼”的，正是近代小说。一般地说，小说发展史上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含有衔接其前后阶段的过渡性质，可是如果从中介过渡环节的角度考察近代小说，就可以发现它的过渡转换作用显示得更为突出，更为重要，节奏更为快速紧凑，形态也更为丰富多彩。

历史上所谓“近代”的划分，通常是指从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发生，到宣统三年（1911）清王朝灭亡期间，总共 72 年。不过，小说的发展并不是随着历史步入近代就立即发生相应的变化。从道光朝至同治朝，整个小说领域在前三十二年里一直在持续古代小说的发展态势，几乎看不到什么变化，直到同治末年新创办的《申报》开始刊载小说，而且是连载翻译小说，这种新因素的呈现才开始打破一切如旧的局面，此时距离清王朝的灭亡已只有近四十年的光景了。在变化伊始，其初始速度很小，各种变化只是细微缓慢地显示，但在各种迅速发展社会因素的刺激下，该运动的加速度也在逐渐加大，于是这种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越来越快，越来越明显。作品数量在爆炸式地增长，翻译小说占据了阅读市场的半壁江山，它们带来的新观念又影响了小说创作，此时不但在题材上突然增加了侦探、政治、科学、探险等许多新门类，其文体也开始异于往常，而白话小说的地位则在快速提升。同时，小说出版已从传统的刊刻一变为运用先进设备与技术的印刷，再加上报纸、杂志等新式媒体的出现，更使小说的传播方式、速度与空间都远非以往所能相比，而作者群与读者群则都在前所未有地急剧扩张。还应该指出的，是阅读市场的运行规则也进入了过渡阶段，从原先的有序到陷入了混乱，继而又重

新走向有序。如果在同治末年或光绪初年步入书肆,那看到的基本上都是线装传统小说,但在清王朝接近终点之时走进书局,呈现在眼前的却已是近乎现代小说的洋装书。成鲜明对比的两种景象的背后,隐藏着方方面面的变化,而这许多巨大变化居然都压缩在四十年里完成了。仅就这点而言,近代小说就已是极有价值且颇具魅力的研究课题,而厘清那千头万绪的复杂事实,则是个严峻挑战,而这恰是研究的基础。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小说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源源不断向其提供活力的便是人类的社会生活,而小说与社会生活间的重要中介之一,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作家。每个作家的创作都是小说机体构成的一个单位,作品的总和,则是抽象意义上的小说。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作品会时多时少地不断增加,这使得小说始终处于运动状态中,而某个阶段没有新作品出现,也是它的一种特殊的运动方式,并表现了它的生存状态。作为活的有机体,小说具有不断向前发展的独立意志,这是指它按文学规律的运动,但是纯文学的运动方式、状态与线路,实际上又是不得而见,因为我们无法将其置于不受任何干扰的“真空”环境中作考察。小说的活力毕竟来源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后者自然会通过与它联系的各种中介环节制约其运动方式与方向。我们最后所观察到的小说行进的路线,其实是各种社会摄动力参与作用后的综合性的结果。

中国小说的历史,其实也是它随着社会生活持续地向更高形态演进且不断壮大的历程,其运动状态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复杂。一般认为小说的萌芽早在先秦时期即已产生,而魏晋南北朝时的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则标志着小说体裁的正式形成。此后直到近代的一千五百余年里,小说创作的发展出现过几次大的变化。首先是唐传奇的创作,“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sup>①</sup>;其次是宋元话本的流行,它可视为通俗小说的开端,其出现适应了正在崛起的市民阶层的娱乐需求,同时意味着小说已被较广大民众接受与喜爱;再次是元末明初《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问世,供案头阅读的通俗小说创作阶段由此开始,尽管直到明中叶后它才成为较普遍的行为;第四次是明清鼎革之际,在长

<sup>①</sup>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时期徘徊于对已有话本、戏曲、民间故事作改编之后，通俗小说创作终于在总体上呈现出文人独立创作的态势。此时，历时近二千年的中国小说在封建时代的行进历程已距终点不远，但它还须经历一次更大的变化时期，那就是近代小说阶段。小说经此从古代而走向现代，此时变化性质之特殊，内容之丰富，形态之复杂，节奏之快速，以及意义之重大，证实了这是中国小说史上最重要也最特殊的过渡阶段。

自中国小说有史以来，它的创作面貌不断地发生变化，概括地说，通常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创作观念未有新旧的更替，而创作的具体内容与形式则依作者的爱好，更重要的是读者阅读趋向的改变而不同于先前，实现这种变化的主要调控因素，则是出版环节择稿标准的决定。在小说史上常见这样的情形，即在一个时间段里，创作总态势未有变化，但其间行时了一阵的流派开始衰落，新的流派则在崛起，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sup>①</sup>另一种形态是因创作观念的改变而导致的变化，即使局部的观念变化，也会使创作的面貌与以往有别。如自明嘉靖至万历年间，依据正史、戏曲、话本等改编主导了通俗小说的创作，这正与当时文坛上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在思想上有某种一致性。此后，作家创作不依傍他作的意识逐渐抬头，通俗小说的创作也就开始向独创的阶段迈进。若观念的变化涉及到对小说地位、作用等重大问题的认识，那么相应的变化就是全局性的了。晚明时，李贽、袁宏道等人对小说地位、作用的充分肯定，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文人们对小说的偏见，不少文人就在此时开始投身于创作，或探讨与小说相关的理论问题，晚明时通俗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因此而发生变化，这是当时创作繁荣的前提条件。可作对照的另一例子是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政府通令全国禁毁小说，康熙帝还发表了指导性意见：“淫词小说，人所乐观，实能败坏风俗，蛊惑人心。朕见乐观小说者，多不成材，是不惟无益，而且有害。”<sup>②</sup>从康熙朝中期开始，清政府几次严厉地禁毁小说，还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条文，这是动用国家机器强制人们改变观念，其结果则是此后小说创作出现了长达

<sup>①</sup>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页。

<sup>②</sup>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九。



半个世纪的萧条。

在小说史上,前一种变化是常态的,故而也较常见,后一种一般则是和整个社会风尚的变迁或政治动荡相联系,这种变迁或动荡引起了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观念的变化,从而导致了创作面貌的改观。可是,这种变迁或动荡及其引起的文学观念的变化之间,一般都有个时间差,其长短则视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置于中国小说发展的大背景中,近代小说 72 年的发展历程,其接近终点的十余年显然是经历了后一种变化,而由于上述的时间差的存在,前三十余年主要是第一种变化形态。尽管鸦片战争的炮声,是长达二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进入终结阶段的标志,在其后的数十年里,社会动荡开始进入活动频繁期,振荡的幅度越来越大,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其激烈程度也不断地强化。然而,这些事件的影响要在小说创作领域中反映出来,却还有待时日,即从鸦片战争到同治末年,小说创作所显示的还只是常态的变化。常态的变化并不是可以轻视或忽略的变化,须知导致后来激烈的、全局性变化的因素,正孕育于其间。

在近代小说研究领域里,近年来人们的注意力较多地倾注于那临近终点的十余年,即通常所说的晚清小说研究。这一研究受到人们的关注自有其道理,因为在这十余年里,小说创作的内容最丰富多彩,变化也最为激烈,集中地作考察,更易凸显当时创作的特殊性。不过,即使同为研究晚清小说者,他们对“晚清”这一时间段的划分并不一致。其终点并无异议,都是到清王朝灭亡,其起点则各家所言略有差异<sup>①</sup>,而划分的不同中又显示出它们的共同处,即较多地考虑了非小说创作因素。可是不管怎样设定起点,晚清小说研究终究是近代小说研究中的一部分。本来,钟情晚清小说者自去研究晚清小说,研究近代小说者自去研究近代小说,其间当然也包含了晚清小说,双方各行其道,其间并不存在,其实也不该有什么争议。晚清小说是近代小说的一部分,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可是近年来情况有了变化。从上世纪最后十年开始,相当一部分现代文学研究者为了探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渊源而向上追

<sup>①</sup> 有的定于发生戊戌变法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这时大量新思想开始涌入中土;有的定为发生庚子国变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这是西历新世纪的开始,正好与“二十世纪文学”的起点相契合;也有定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因为此时《新小说》创刊,梁启超开始大力倡导“小说界革命”。